

千佛洞

千佛洞，又叫莫高窟，位于甘肃省敦煌县城东南 20 多公里的地方，是举世闻名的古代艺术宝库。

千佛洞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魏、晋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七个朝代，1000 多年开凿的。在鸣沙山断崖峭壁上，南北两段 3 里多长地方，开凿了 1000 多个洞。由于自然力的侵蚀和人为的损毁，现在保存完整的只有 486 个，其中隋窟有 110 个，唐窟 247 个，五代窟有 36 个。这里主要反映了隋唐五代的艺术成就。

千佛洞里珍藏着以壁画和雕塑为主要形式的艺术作品。

壁画所描绘的内容，多是佛传故事、佛菩萨像、佛经图说和佛教徒像等等。画师们以平易近人的描写手法，把佛教题材和神话传说，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。我们透过宣传迷信的画面，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、生产情况和生活习俗。

在隋代石窟的壁画中，有伐木、饮马、牛车、驼车等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片断。在唐代壁画中，场面宏大，结构富丽，表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兴旺景象，生动细致地反映人民生活的各种情节。艺术家们虽然不能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来描写宗教的题材，但他们巧妙地把自己所衷心爱慕、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，也渗透在作品里。

敦煌壁画继承了民族传统，成功地吸收了外来因素，创造出各代独特的风格。在各种姿式的菩萨像中，唐代的菩萨像丰腴的身材，优美的神态，是唐朝妇女健美形象最鲜明的写照。壁画中的许多“飞天”，忽上忽下，左右回旋，飘带轻软，姿态动人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装饰画面的各种优美图案，花样繁新，色调和谐，成为壁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

泥塑，是千佛洞又一珍贵的遗产。它包括浮雕和立塑两部分。从主题内容来看，有千佛、飞天、伎乐、花饰、建筑物、柱头、狮、象、

天狗等 20 余种。

千佛洞的彩塑，具有民族艺术传统。它的制作不是用大块石头，从外向里逐渐加工雕琢，而是利用湿润、柔软和易于操作的泥土，自内而外捏塑成的。这种便于细腻地刻画人物风采，通过质体和光色表现完美艺术形象的彩塑，不能曝露在室外，只能成为富丽堂皇的建筑内部的主要构成部分。这就显现中国古典艺术建筑、雕塑、绘画三者互相依存、密切联系的特点。

隋朝重新建立统一帝国，虽然只有短促的 20—30 年，但在千佛洞中修建的洞窟不仅数量较多，而且装潢得富丽堂皇。隋代彩塑也突破了以往呆板的类型，进一步充实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内容，扩大了描写现实形象的范围。在这以前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，涌现出许多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寄托，不惜冒险远涉大漠瀚海到印度去求经的高僧事迹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代人民对现实的强烈追求。所以，塑造那些前仆后继、冒险旅行的宗教信徒，表现那种不惧风雨的大无畏精神，成为隋代彩塑艺术上的突出特点。

唐代的造像师们不满足以往比较单纯朴实的造型与彩绘，在神采和形象两方面超越了前代。唐塑的“力士”形象，在面貌姿态上刚猛威武，在肌肉肤色上，健壮雄厚，表现出横戈跃马的武士的威严神气。有一个长达 15 公尺的“涅槃”造象，描写的是佛教主释迦牟尼临终的故事。人们看去，这个巨大的泥塑，就是由于劳动疲倦以后，在安静地休息的唐代妇人的睡态。周围 72 个大弟子，有“呼天抱地”的号哭，有“涕泪交流”的悲哀，有用理智控制着的愁眉苦脸，种种不同的面部表情，形象地表现了复杂的内心世界。

五代的洞窟，在千佛洞大体是由原来隋、唐洞窟重新装绘的。五代的彩塑姿态比较生硬，神色也呆滞，衣裙繁杂紊乱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。

千佛洞还有一个“藏经洞”，是 1900 年被人们发现的。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对这一发现置之不理。以后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纷

纷来这里盗窃。“藏经洞”里的珍贵文物，如写经、绘画、织绣，甚至壁画，被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美国、沙俄的侵略分子盗去许多，至今未归还。

傅奕与法琳

唐初，就对佛教的政策问题，曾在朝臣中展开了一次面对面的激烈辩论。

起因是太史令傅奕曾指斥僧尼“剥削民财，截割国贮”，先后七次上疏奏请废僧尼，减塔寺。僧侣法琳亦著《破邪论》等，狂骂傅奕。这场争论已进行了五年之久，唐高祖李渊遂就傅奕的奏疏，令朝臣们辩论对佛教的政策。

朝议一开始，宰相萧瑀就率先站出来指斥傅奕，说：“佛是圣人，诽谤圣人就是无法无天。傅奕毁圣谤佛，臣请诛傅奕！”

萧瑀的调子这样高，不是偶然的。当时朝廷上崇佛的势力远远超出了反佛的势力。法琳早得到太子李建成的支持，并誉太子为“护法菩萨”。

傅奕当然也洞悉当时的形势，但他坦然自若，从容说道：“圣人是崇礼的。礼是什么？在家事亲，在朝奉君。可是，佛教却教人弃家去园，无父无君。萧瑀并非异国臣民，却尊奉异域邪说，无父无君。这样的人又何以能忠于朝廷呢！”

傅奕义正辞严，萧瑀无言以对，只是俯首合十反复诅咒说：“反佛死后要下地狱的！”

朝臣们齐声附和萧瑀，赞同傅奕的只有一人。但是，高祖李渊还是采纳了傅奕的奏议，发布了诏令，准备禁佛。正这时，发生了“玄武门之变”，高祖也被迫传位，禁佛暂被搁置。

唐太宗继位后，问傅奕：“佛理很深奥，佛的品德也值得学习，因果报应的話也很灵验，卿为何以为不可信呢？”

傅奕说：“崇佛事僧，对百姓没有好处，对国家却有害处啊！”

唐太宗深以为然。

唐初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族门阀的政治势力虽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，但社会的习惯势力还很强大。尽管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，可是论门阀，还低于山东世族，常被山东世族所轻视，他为了自高门第，遂认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聃为家祖，提倡尊奉老子，并诏令全国，凡行法事，道士、女冠可在僧、尼之前。

自隋以来，佛、道的势力已相匹敌，故而，隋虽崇佛，但公开表示也还是僧道并尊。唐初规定僧道的地位，道为第一，佛为其次。由是僧道更加牴牾。

先时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，曾作《醉僧图》，活现了醉僧的狼狽可笑之状，道士们每每用这张名画来取笑僧侣，遂使僧侣们十分恼火。僧侣于是筹聚了几十万钱，去请当代的大画家阎立本画一幅《醉道士图》，以求报复。阎立本果然画了一幅。这张名画流传下来了。它就是唐代佛道矛盾的写真。但历史事实，僧道的斗争比这激烈得多。

唐太宗的诏令下达以后，僧侣们大为不满，纷纷集于宫阙下示威抗议。

法琳则面见唐太宗，力图争辩，说经他考证，李氏的远祖有两支，一是代北李氏，原出鲜卑拓跋部，一是陇西李，即老子的李氏。又说：“老子的父亲是个乞丐，是个跛子，没有耳朵，还瞎了一只眼，⁷²岁时还娶不到老婆，同邻居家的老女仆私通，才生下李聃。”法琳还想劝唐太宗自为代北李，用不着同陇西李去认本家。他还没说完，唐太宗早已勃然大怒，斥责法琳：“毁我宗祖，谤我先人，要挟君王，罪不容诛！”

唐太宗又对法琳说：“你著的经卷里说，有念观音者，刀不能伤。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，到期拿你试刀，看看到底伤不伤！”

法琳被关进狱中，心中恐惧，明知就是念七七四十九天观音，刀放在脖子上也是要死的。但他毕竟是个老于世故的和尚，终于想出一条活命的办法。当太宗使人来问：“刑期已到，你念观音有

无灵验？他回答说：“七日以来，我不念观音，只念陛下。”太宗又使人问他：“诏令你念观音，你为何只念陛下？”他又说：“陛下功德巍巍，照经典说，陛下就是观音，所以只念陛下。”法琳的气焰全消了。

唐太宗见此，也就免了法琳的死罪，流放他到远州僧寺去，后死在路上了。

唐太宗尊奉家祖，又诏令道先佛后，流放了法琳。但是，他并不抑佛，这只要看一看他对高僧玄奘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。

黄袍加身

公元 960 年，宋太祖赵匡胤 推翻了后周政权，建立宋朝，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，重新统一了中国。

赵匡胤夺权是轻而易举的。他原来是后周的一员战将，曾经在周世宗柴荣掌政时期，屡建战功，当上殿前都点检的军职，统领精锐的禁军。公元 959 年，周世宗死去，继位的恭帝只有七岁。赵匡胤又得到防守京师开封的宋州归德军节度使的实权，成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公元 960 年元旦，镇州、定州派人谎报军情，说北汉和契丹联合向南进攻。后周宰相范质等人，派遣赵匡胤率兵前往抵抗。赵匡胤先派出了前锋部队。京城里传出了“点检为天子”的消息，老百姓非常恐怖，害怕朝廷夺权祸及百姓，纷纷四出躲藏。可是，朝廷内毫无动静。过了几天，赵匡胤和后续部队出发了。他部下一个小官，宣称自己通晓天文、看见太阳下面又出现一个太阳，放射着光芒，这是天命赵匡胤当权。这天晚上，赵匡胤的部队走到京师城北 20 里的陈桥驿，就驻扎下来。一些将士议论：“皇帝年岁这么小，我们出死力打仗，有谁知道呢？不知先拥立点检为天子，然后再北征，也不晚啊？”他们把这些想法，对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说了。这些将领又商量了一夜。

第二天他们又派人回京，向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都虞侯王

审琦联系。这两个人平时都倾向赵匡胤,对拥立赵匡胤完全同意。

下一天的早晨,赵匡义等许多将领拥进赵匡胤的寝室。赵匡义、赵普把大家的来意说明。赵匡胤假装酒醉,慢慢地起来。将校列队在庭前说道:“我们没有主心骨,愿意拥护你为皇帝!”没等赵匡胤开口说话,大家就把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,都向他跪拜,高呼万岁。并且,立即把他推上了马,回到开封,正式当了皇帝,定国都开封,改国号为宋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北宋。赵匡胤就是宋太祖。

赵匡胤有一天问宰相赵普:“自唐末以来,帝王换了十二个,战争不止,什么原因?要使国家安定长久,有什么办法?”赵普回答说:“因为藩镇权力太重。只要夺他们的权,天下就安定了。”赵匡胤说:“你不要再说了,我已经明白了。”

公元 961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,宋太祖赵匡胤正宴请石守信、王审琦等军事将领。酒过数巡,赵匡胤屏退左右侍从,说:“我没有你们帮助,不会有今天这个地位。可是,做皇帝也有难处,不如做节度使时快活。我自从做了皇帝,没睡过一晚安稳觉。”

石守信等人问他什么原因。他说:“这不难理解。我所处的位子谁不想做呢?”石守信等人着了慌,急忙说:“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呢?现在天下已定,谁还敢有二心?”赵匡胤说:“你们虽没二心,部下一旦将黄袍加到你们身上,那就由不得自己了。”石守信等说:“我们没想到这层,真是愚蠢。请皇上指示我们应该怎么办吧。”赵匡胤说:“你们何不把兵权交出来,到地方上去做个大节度使,为子孙多置些家业,多养些歌伎舞女,快乐过个晚年。”

第二天,石守信等将领都说有病,请求辞去军职。赵匡胤一一批准。这就是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故事,反映了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措施。

赵匡胤为了巩固政权,还在中央政府增设‘参知政事’(副相),又以‘枢密使’管理军政;‘三司使’管理财政,以分割宰相‘事无不统’的权力。中央司法部门除刑部外,复设大理寺和审刑院职,共掌司法权,互相制约。

在地方,命令各节度使所领的‘支郡’都直属中央政府,州郡长官必须由文官充当,三年一任,期满调往别处,防止地方官‘久任权重’。在一些重要的州,增设‘通判’,用以牵制知州的权力。地方赋税除小部分留州外,其余送缴京师,并设置税收场务监和各路转运使,具体负责执行这项工作。

为了防止藩镇割据重演,北宋规定各州把精壮的地方兵选送中央,编入禁军,实行‘更戍法’。禁军经常轮流到各地守卫,使‘兵无常将,将无常师’。废除殿前都点检的兵职,把禁军分属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管辖。这‘三衙’的长官地位较低,没有调兵权。军队调遣和移防,都要有枢密院的命令。有事出征多临时命将,或由皇帝主帅。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军队的指挥权,“朝召而夕至”,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。

宋灭荆(南)湖(南)

宋建隆 4 年(963 年),宋太祖赵匡胤遣军攻灭荆南、湖南两割据势力的作战。

宋太祖在平定内部叛乱后,鉴于唐中期以来武人专权、藩镇割据造成的长期动乱局面,开始进行一系政治、军事改革,以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,使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重新稳定下来。当北宋政权稳固确立以后,宋太祖便开始着手统一全国的战争。

当时,中国境内割据政权林立。北方有强大的辽国和依附于辽国的北汉(占有今山西大部地区),西北有党项族地方政权,西南有藏族、白族和彝族建立的地方政权,南方则有南唐(占有今江西,安徽南部,江苏、湖北、福建之一部)、吴越(占有今浙江,江苏、福建之一部)、南汉(占有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湖南之一部)、后蜀(占有今四川东部及陕西、湖北之一部)、武平(占有今湖南大部及贵州一部)、荆南(占有今湖北巴东、秭归、宜昌、荆门、江陵、沙市、石首等县市)、清源(占有今福建漳州、泉州等地)等 7 个割据政权。宋太

祖与其主要谋臣赵普，参考了后周显德 2 年(955 年)比部郎中王朴所献“平边策”，制定了“先南后北”的统一战争战略方针，准备首先并吞南方各割据政权，在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后，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辽国，消灭北汉。为此，宋太祖陆续选派了一批得力将领，率兵守卫北方要地，防御党项、契丹和北汉，加强北面防务，然后挥军南下，对南方 7 个割据政权各个击破。

建隆 3 年(962 年)9 月，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(驻朗州，今湖南常德)周行逢病死，其 11 岁的幼子周保权即位。衡州(今湖南衡阳市)刺史张文表乘机发动兵变，占领潭州(今湖南长沙)，威逼首府朗州(今湖南常德)，湖南陷入内乱之中。武平统治者一面派亲军指挥使杨师璠率兵进击张文表，一面派人向荆南和宋朝求援。11 月，荆南统治者(荆南节度使)高保勔也病死，其侄高继冲即位。早就图谋南下的宋太祖，看到武平和荆南接连发生丧乱，认为是消灭荆(荆南)、湖(武平)的大好时机，决定加紧谋划出兵。他首先派酒坊副使卢怀忠去武平，刺探“人情去就，山川向北”等情况，赵匡胤闻报大喜，遂决定乘荆南和武平混乱为名灭荆南，以援救为名灭武平。至此，拉开了宋灭荆、湖之战。

乾德元年(963 年)正月，赵匡胤一面答应出兵援助武平，一面向荆南借道，并要求荆南高继冲派水军 3000 人助攻潭州。正月初七，宋军开始行动。宋太祖命山南东道(治襄州，今湖北襄阳)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，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，率安(今湖北安陆)、复(今湖北天门)等 10 州兵，借道荆南向武平进军。荆南对北宋借道的要求，有两种不同主张：兵马副使李景威请求率军 3000 在荆门(今湖北荆门)依险设伏，攻其不备。节度判官孙光宪等认为宋军强，进攻张文表如山压卵，平定武平，必危及荆平，大势所趋，抵抗无益，不如早降，免除战祸。高继冲同意孙光宪等人的建议，因而未作任何抵抗准备。李景威因设伏荆门的建议未被采纳，便愤而自杀。2 月，宋军到达荆门(今属湖北)，遣使向荆南假道，并要求给宋军供应粮草。这时，高继冲对宋军是否以借道为

名吞并荆南，疑信参半。为了弄清宋军真实企图，便遣使以犒师为名来迎宋军。2月初九，使者与宋军在荆门相遇，慕容延钊假意殷勤招待，暗中则由李处耘率轻骑数千，乘夜倍道向江陵急进。高继冲闻讯至城外出迎，李处耘要他等待延钊大军，而李处耘自己则率兵先入城，迅速占领江陵城内要地。高继冲见大势已去，举城投降。荆南遂亡。

宋军灭荆南后，继续调动军队，征调荆南军万余人，合力向武平急进。武平的军队在杨师璠的指挥下，已击杀叛将张文表，攻克潭州，平息了内乱。但宋军仍继续昼夜兼程直趋朗州，武平周保权见势不妙，非常恐慌，急召群臣谋议。观察判官李观象认为，张文表已死，而宋军仍然急进，其目的显然要夺取湖、湘之地。现在高继冲束手听命，唇齿既亡，朗州势难抵敌，主张迎降。指挥使张崇富等反对出降，力主抵抗。宋将慕容延钊遣阁门使丁德裕前往诱降，张崇富拒不接受，并派兵严守要隘，凿沉船只，伐树塞路，以阻宋军。宋太祖又派人向周保权劝降，也遭到拒绝。于是，宋将慕容延钊分兵两路，水陆并进。水师东趋岳州（今湖南岳阳），陆路则出澧州（今湖南澧县），进指朗州。水路由战棹都指挥使解晖和战棹都监武怀节指挥，率舟师从江陵沿长江顺流而下。2月末，水师大破武平军于三江口（今湖南岳阳北），缴获战船 700 余艘，歼武平军 4000 余人，俘统军使黄从志等将校 14 人，进占岳州。陆路由李处耘率部先行，慕容延钊统大军继后，3月初进至澧州南，同武平张崇富军遭遇，击溃张军。接着占领朗州，擒杀张崇富，生俘周保权。武平大将汪端带领部分军民逃匿山泽，继续抗拒。9月末，慕容延钊遣军杀汪端，湖南遂平。

宋军灭荆南和武平后，宋太祖派出得力官吏，在两地进行管理。同时对高继冲、周保权及其部属分别授以高官，进行安抚，又数次减免荆、湖地区的租税，争取当地民众，从而很快稳定了局势。

平定荆湖

唐末及五代各朝，虽对荆湖地区的官吏时有加封，但终不能行使有效统治。唐末襄州赵匡凝破雷彦恭于荆南，以其弟赵匡明为留后。梁破襄州，赵匡凝奔吴，赵匡明奔蜀，开平元年（907年），以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。荆南后来管辖十个州，高季兴始到，只有江陵一城，但经高季兴祖孙三代经营，基本统一荆南，形成了割据一方之势。建隆元年（960年），高保融死，弟高保勳立。

建隆3年（962年），武清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周行逢病重，托孤于将领，特别交待说：“与我同起者十人都已被诛杀，唯独衡州刺史张文表还在，此人有野心，因未得到军权而常怏怏不乐。我死后张文表必叛，不得已时，可归顺朝廷。”不出所料，周行逢死，子周保权立，张文表大怒说：“我与周行逢同起微贱，共立功名，今日安能北面事儿乎！”张文表佯称去武陵奔丧，过潭州，潭州行军司马廖简不防，军吏报张文表军至城下，廖简对宾客说：“张文表一到便会成为我们的俘虏，何足忧！”继续饮宴，张文表的军队到达官府后，廖简却醉得无法操戈，坐在地上大骂。廖简及宾客都被杀害，潭州被张文表占领。周保权一方面派遣杨师璠征讨，另一方面派遣使者去向宋和荆南求援。

起初，宋太祖派遣卢怀忠出使荆南，了解江陵的地形、人情。卢怀忠返回报告说：“高继冲兵甲虽然整齐，但只有三万粮食虽然丰收，但百姓困于暴敛。江陵南通长沙，东距建康，西迫巴蜀，北奉朝廷。观其形势，日不暇给，很容易将它攻下。”宋太祖以为：“江陵四分五裂之国，今借道出师，可因而灭之。”于是派遣慕容延钊、李处耘等率领兵马，声言救周保权，实际上是去先取荆南。

乾德元年（963年）正月，慕容延钊、李处耘率军到襄州，派丁德裕去通知高继冲要求借道，并命令其准备军需。当时高继冲还年幼，政事均委托孙光宪掌管，军事则委托梁延嗣掌管。荆南摄于

宋军威力，答应了宋的要求，但提出宋军不要靠近江陵，在百里之外驻扎，并且还可以提供供给。李处耘接着又遣丁德裕出使荆南，孙光宪、梁延嗣便请高继冲答应宋军到江陵的要求。兵马副使李景威对高继冲说：“今王师借道以取湖湘，然而看其形势，恐怕是要夺取我们的地方。”他请求率 3000 兵伏于荆门道险处，夜破宋军主帅，然后率军取张文表，向宋赎罪，认为这样，荆南既有大胜，宋又无可奈何，不然必有摇尾求食之祸。高继冲以为年年给宋进贡，必无此事。孙光宪以为宋军伐张文表，尤如泰山压卵，湖湘既平，岂有放过荆南之理。他主张归顺朝廷，永享富贵。高继冲接受了他的意见。李景威见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用，沉痛地说：“大事去矣，生有何用？”遂自杀身亡。

随后，高继冲即派遣梁延嗣与高保寅以牛酒到荆门犒劳宋军。李处耘待之以礼，并命令他们次日返还。梁延嗣立即遣使报高继冲，以为宋军不会取荆南。荆门距江陵还有百余里。当夜，慕容延钊召梁延嗣同饮，同时则命令李处耘率轻骑数千急驰江陵。高继冲正等梁延嗣、高保寅还，以便问明详情，忽闻宋军至，惶恐不安，只得匆匆到江陵北十五里迎李处耘。李处耘待之以礼，令其在原地等慕容延钊，自己率军先入江陵。待慕容延钊与高继冲到江陵，宋军已占据险要地段和大街小巷。高继冲已经明白，但为时已晚，只好交出牌印，并命令王昭济等奉降表于宋军。荆南 3 州、17 县、142300 户归于宋朝。

宋军既平荆南，日夜发兵趋朗州。是时，杨师璠已俘斩张文表，夺回潭州。周保权对宋军举动感到疑虑，急召臣僚研究对策，臣僚意见不一。以观察判官李观象为首力主归顺，他提出：请宋出师本来就为的是诛张文表，今张文表已诛，而王师不还，必将尽取湖湘之地。湖湘所能依托的北有荆渚，以为唇齿，今高氏束手听命，朗州势难独全，不如归顺，换取富贵。指挥使张崇富则主张拒守，积极备战。不多时，慕容延钊派丁德裕至朗州，张崇富不接纳。丁德裕不敢与张崇富战，退回报命。宋太祖又派去使者责备周保

权说：“王师应你们请求，解救你们的危难，今天妖贼既灭，你们为什么忘恩负义，反拒王师？这是自取灭亡。”周保权不顾宋太祖的威胁，采纳主战派观点，拒绝归顺。

于是，慕容延钊派遣武怀节攻岳州，破周保权军于三江口，获战船 700 余艘，斩首 4000 余级，占领岳州。3 月，李处耘军与张崇富军在澧州南面相遇，宋军一直追到敖山寨，大败张崇富军，俘获大批人马，并选肥胖者数十人，令士兵分而食之，少壮者皆黥面，遣回朗州，慕容延钊随其后。黥者入城，言被俘者为宋军所食。湖湘兵大为惊惧，放火烧城，驱百姓奔山谷。宋军占领朗州，俘张崇富于西山，梟首示众。汪端与周保权藏在江南岸僧舍之中。李处耘派田守奇追捕，汪端逃走，周保权被俘。湖南平，得州 14、监 1、县 66、户 97388。

湖南辰州，唐时分为锦、溪、巫、叙四郡，唐末为少数民族首领割据。宋既平湖南，选定了瑶族人秦再雄为刺史，令其招抚诸郡。秦再雄深感宋恩，招兵买马，训练士卒，宣传宋招抚之意，所到之处皆归顺。

宋灭后蜀

宋乾德 2 年(964 年)至 3 年，宋太祖赵匡胤遣军攻灭后蜀的作战。

唐王朝崩溃后，中原地区先后有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的更替，在巴蜀、江南和河东(今山西境内)，先后建立了前蜀、后蜀、吴、南唐、南汉、吴越、闽、南平(荆南)、楚(后为武平)和北汉共十个割据政权，史称五代十国。在广大边疆地区，还有契丹(辽)、回鹘、吐蕃、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。这时的契丹也很强盛，并从后晋石敬瑭的手里，夺取了燕云 16 州，乘中原混战，时常南下袭扰，以后又控制北汉，威胁中原。五代十国共历 53 年(907—960 年)，是一个由动乱、分裂渐趋统一的时期。

后周太祖广顺元年(951年),郭威即位后,为了巩固其统治,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。世宗元年(954年),柴荣(郭威养子)继承郭威的皇位。柴荣是一个革新图强,较有作为的君主。他先后实行均平田赋、整顿吏治、加强法制、裁减冗兵等一系列改革措施,使后周的实力日渐强盛。柴荣为了扩大其统治范围,西攻后蜀,取得凤(州治在今陕西凤县东北)、秦(州治在今甘肃秦安北)、成(州治在今甘肃成县)、阶(州治在今甘肃武都)4州;南攻南唐,占领淮南江北14州;北攻辽,夺取瀛(州治在今河北河间)、莫(州治在今河北任丘北)、易(州治在今河北易县)三州,为以后北宋的统一打下了初步的基础。后周显德6年(959年)6月,柴荣病死,由其幼子柴宗训即位。

显德7年(960年)正月初四,掌握禁军的归德(治宋州,今河南商丘南)节度使、殿前都点检赵匡胤,乘“主少国疑”之机,发动“陈桥兵变”,夺取了后周政权,建立宋王朝(史称北宋),改元建隆。

赵匡胤出身于大官僚家庭,身经五代的更迭,久统禁军,深知兵权的重要。他和谋臣赵普分析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、武人跋扈,以致战乱不已、朝代频繁更替的历史教训,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,实行高度的君主集权制。他把过去节度使掌握的兵权、政权、财权收归中央,以加强中央集权。为收兵权,建隆2年(961年)闰2月,赵匡胤免去了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的职务。同年七月,召集主管禁军的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王审琦、张令铎等将领宴饮,名义上劝他们“多积金钱,厚自娱乐”,实则威逼他们“释去兵权”,出任地方大使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杯酒释兵权”。随后,他消灭了后周残余势力在潞州(州治在今山西长治)的李筠、扬州的李重进等,巩固了统治,便着手整顿内部,加强中央集权,恢复农业生产,发展工商业,注重军队的训练,实行精兵政策,因而实力不断增强。

当时对北宋统一关系较大的割据政权主要有后蜀、南唐、南汉、吴越、南平、武平、北汉7个。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很严重,阶级矛盾尖锐。他们力量不强,兵力不多。而北方的北

汉,地区虽小,但士卒强悍,且受契丹的支持,威胁宋王朝的北部地区。早在后周时,比部郎中王朴曾提出“攻取之道,必先其易者”,主张首先并吞江南,然后收复燕云 16 州,最后消灭北汉。但周世宗没有采纳,而是在取得南唐江北之地后,转锋北上,直指幽蓟,后因中途患病而撤军。赵匡胤即位后不久,北汉便出兵攻宋的河西地区,又策动李筠反宋,于是赵匡胤在消灭李筠之后,便企图先攻北汉。但熟悉北汉情况的武胜(治邓州,今河南邓县)节度使张永德认为:“太原(指北汉)兵少而悍,加以契丹为援,不易取也。臣以每年多设游兵,扰其农事,仍发间使以谍契丹,绝其援,然后可下也。”华州(治所在今陕西华县)团练使张晖也不主张立即进攻北汉。赵匡胤采纳了他们的建议,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意图,实行先南后北,南攻北守的战略。为此,赵匡胤于建隆 3 年(962 年)4 月,选派一批得力将领,率兵守卫北部要点:在延州(治所在今陕西延安)、环州(治所在今甘肃环县)、原州(治所在今甘肃镇原)、灵武(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)屯兵,以防备党项(即后来的西夏)在关南、瀛州(今河北河间)、常山(治所在今河北正定西南)、易州、棣州(今山东惠民一带)驻兵,以防备契丹控制西山(今恒山)、晋州(治所在今山西临汾)、隰州(治所在今山西隰县)、昭义(治所在今山西长治),以防御北汉。北面的防守加强后,才挥军南下,分别击灭南方的各割据政权。

建隆 4 年(乾德元年 963 年),赵匡胤消灭了南平、武平后,控制了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,使后蜀东北两面处在北宋的钳制之下,取得了溯江入蜀的有利条件。于是积极筹划攻蜀。后蜀是后唐末期西川(治所在今四川成都)节度使孟知祥所建。据有四川、汉中共 45 州,建都成都。其后孟昶继立,君臣奢侈,政治腐朽。

乾德元年(963 年)4 月,赵匡胤任命张晖为风州团练使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使,令其详细勘察川陕地形,以备由陆路攻蜀;加紧在开封城南朱明门外凿池引蔡水,造楼船百艘,训练水军号“水虎捷”,以备由水路溯江入蜀。命诸州造轻车,以供山地输送之用。设

西南面转运使，作攻战的物资准备。这时，后蜀主孟昶闻宋欲兴师，感到了宋军的威胁。宰相李昊建议孟昶向北宋纳贡，以求偏安自保。但掌握军政大权的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则劝孟昶先发制人，不可坐而待毙。孟昶决计严兵拒守，以抗宋军。当时，北宋东临三峡，北控陇右和秦岭各隘，但后蜀前方所能依恃的要地，尚有长江三峡和米仓山等。于是，后蜀一方面派兵东屯三峡，并在涪（今四川涪陵）、泸（今四川泸州市）、戎（今四川宜宾市东）等州扩充水军，以为后援。另一方面派人约北汉同时举兵，准备联合攻宋。乾德2年（964年）10月，孟昶派大程官孙遇、军校赵彦韬等出使北汉，约其南下联合攻宋，并预定蜀军出黄花（今陕西凤县东北）、子午谷（今陕西西安南），与北汉夹击宋军，夺取关中。但是赵彦韬中途叛蜀投宋，并向赵匡胤密报了后蜀实情，并绘呈后蜀的山川形势和兵力分布图。赵匡胤正欲伺机攻蜀，得到后蜀约北汉攻宋的密书后，高兴地说：“吾出师有名矣！”

乾德2年（964年）11月初二，赵匡胤发兵5万（一说6万），分两路攻蜀。令王全斌、崔彦进为西川行管凤州路正、副都部署，王仁贍为都监，率北路步骑3万出凤州（今陕西凤县东北），沿嘉陵江南下。令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，曹彬为都监，率东路步骑2万出归州（今湖北秭归），溯江而上。两路分进合击，直指成都。临行前赵匡胤分别以阵图授予王全斌和刘光义，并向刘光义指示方略说：蜀军在夔州（今四川奉节东）设有锁江浮梁（即浮桥），上置木栅三重，夹江配置炮具，封锁江面。因此要先夺浮梁，然后水陆夹击，方能取胜，并严令三军不得“焚荡庐舍，驱略吏民”；违者以军法从事”。

孟昶得知宋师来攻，命王昭远为行营都统，赵崇韬为都监；韩保正（一作韩保贞）、李进为正、副招讨使。王、赵率兵约3万自成都北上，扼守利州（今四川广元）、剑门（今剑阁东北）等关隘。韩、李率部数万驻守兴元（今陕西汉中），加强北面防御。东面仍由昭武节度使高彦俦等扼守夔州（今四川奉节）。

乾德 2 年(964 年)12 月中旬,北路宋军攻入蜀境,所向皆捷,连拔兴州(今陕西略阳)外围各要点。12 月 19 日击败蜀军 2000 人,进克兴州,得军粮 40 余万斛。蜀兴州刺史蓝思筥退保西县(今陕西勉县西)蜀军招讨使韩保正闻兴州失守,放弃兴元,移师西县(今勉县西)。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先锋军进攻西县,韩保正懦怯不敢迎战,派兵数万依山背城,结阵自固,被史延德击退,宋军又获粮 30 余万斛。于是崔彦进、史延德与马军都监康延泽等率部乘胜追击,俘韩保正、李进,越过三泉(今陕西勉西南约百里),直抵嘉川(今四川广元东北 50 里),虏杀甚众。韩、李余部为阻宋军南进,烧绝栈道,退保葭萌(今四川广元西北)。时蜀将王昭远、赵崇韬率军屯驻利州(治所在今四川广元)及以北的大、小漫天寨(分别在利州城北 25 里、40 里)诸要点,立寨而守。利州在嘉陵江东岸,群山环绕,形势险峻,是入蜀的咽喉之要路。因栈道断绝,宋军被阻,难以直进。王全斌遂率主力由喜川东南的罗川小路迂回南进,由副都部署崔彦进率军一部,赶修栈道,进克小漫天寨,然后会攻利州。宋军如计而行,破小漫天寨,蜀军退保大漫天寨。不数日,王、崔两部会师于深渡(大、小漫天寨之间嘉陵江渡口),并夺占桥梁。旋又分兵 3 部夹攻大漫天寨。蜀军集中精锐奋力抵抗,但被宋军击溃。宋军乘胜拔取蜀军各寨,俘义州刺史王审超等。王昭远、赵崇韬率兵堵截宋军,三战皆败,宋军追至利州北。王昭远等弃城渡江退保剑门(今四川剑阁东北),撤退时焚断浮梁。宋军于 12 月占领利州,获军粮 80 万斛。宋军获得大批粮食,避免远途转漕,颇得因粮于敌之利。

东路宋军的进展也很顺利。12 月下旬刘光义等攻入巫峡,连破数寨,共歼蜀水、步军 1.2 万余人,杀其将南光海,擒其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,夺得战船 200 余艘。乘胜向夔州急进。夔州为巴东之咽喉,蜀军于城东设锁江浮桥,上置木栅三重,夹江列,防御甚严。刘光义军进抵夔州锁江浮梁 30 里处,按照赵匡胤‘切勿以舟师争战,当先遣步骑潜击’两岸蜀军的预定方案,遂舍舟登岸,击败

两岸守军,夺取浮梁。接着牵舟而上,进兵至白帝城(即夔州州治)西。蜀宁江(治夔州)节度使高彦俦认为:“北军(指宋军)涉险远来,利在速战,当坚壁待之。”但监军武守谦认为敌至城下,不能避战,必须出击。12月26日,武守谦独自行动,率所部1000余人出战,大败而归。宋军跟踪追击,突入城内,高彦俦力战不胜,愤愧自杀。宋军占领夔州后,沿江西上,收降万、开、忠、遂(今四川万县市、开县、忠县、遂宁)等州,打开了由长江入蜀的大门。

乾德3年(965年)正月,蜀主孟昶闻王昭远等败,惊惧之余,遂命素不习武的太子玄喆为元帅,率兵万余增援后蜀的重要屏障剑门。时宋军北路军自利州直趋剑门,进占益光(今四川昭化)。宋军见剑门险峻,有人提出以大军由剑门东南的来苏小路进军,绕至剑门之南,断其后路。康延泽分析当时情况,认为蜀军数战数败,士气低落,可急攻而下,主帅不宜自率大军行狭径作此迂远进攻。于是,王全斌知剑门天险,不易强攻,命史延德率兵一部经城东南来苏小径迂回至剑门南,自率精锐从正面进攻剑门。蜀守军一部见宋军由小路往来苏,弃寨而逃;王昭远也处置失当,仅以一将防守剑门天险,自率大军退守汉源坡(今剑门东)。宋军乘势前后夹击,速克剑门,并趋汉源坡。蜀将赵崇韬布阵迎战,而王昭远惊惧,战守无方,竟“据胡床(可折叠的轻便坐具)不能起”。未经激战,宋军即击败蜀军,残其万余人,擒俘都统王昭远,乘胜占领剑州(今四川剑阁)。正月初,蜀太子元品进至绵州(今四川绵阳东),听到剑门已失,仓皇逃回成都。正月初,北路宋军直逼成都城下,接着东路也续至。正月初七,孟昶见大势已去,举城降,后蜀亡。赵匡胤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。随即下令减免蜀境租赋,派参知政事吕余庆入成都主政,逐步平息各地骚乱,巩固了对蜀地的统治。